

深度

■ 在过去数十年间，哲学界在动物认知、动物道德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深入剖析相关研究的哲学蕴涵，在此基础上尝试为一种更具进取心的动物哲学辩护，或可整体性地提高社会对动物的认识水平，促进动物认知、动物伦理等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 《元史》是最早全面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元史》纂修与版本研究”(22CTQ003)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元史》文献学研究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发展实物版本学是《元史》文献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开拓《元史》文献学研究新局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 张 良

有关《元史》材料来源、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的研究,自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赵翼等前辈奠定规模,成果迭出。市科瓚次郎、余元鑫则最早系统梳理《元史》各部分材料来源。自1971年开始,中华书局组织开展《元史》点校,至1976年毕功。以此为契机,《元史》及其派生文献研究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颇受学界关注。

《元史》文献研究屡有创获

在中华书局整理本当中,《元史》校勘水平以及学术成就无疑是较为突出的,甚至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可以被视作二十四史乃至《元史》本身进一步整理的标杆。在文本校理方面,无论是利用《元史》传本的精细程度,还是拓展中西参校文献的广度和深度,均达到相当深入的水准,并在理论层面开展了有益尝试。相应地,围绕《元史》纂修经过、材料来源、传本谱系、后世流传屡有创获。然而,随着旧有研究业已形成体系,至20世纪末,相关研究颇有题无剩意之慨。即便是在此背景下,依然有不少重要成果面世。

当然,既有成果还存在种种不足。第一,多关注文本“内证”,对属于物质形态层面的版本问题因袭成说,关照不足,陷入了“向壁观书”的窠臼。第二,文本对照失之粗糙,部分观点因袭旧误。第三,史料搜集尚有余地。早期成果受限于时代,大多不能穷尽相关文献。此外,文集、方志、谱牒、金石、类书等材料还有搜稽空间。第四,对《元史》纂修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关照不足。

研究条件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元史》文献学研究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元史》版本条件更新迭代。《元史》洪武初刻存世极少。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史》一书即以洪武残缺配明嘉靖八至十年南京国子监修补本(早期南监本)影印。其洪武板片多有描润,文本董理瑕瑜互见,板片则大失旧观,绝不能以洪武原本等而视之。20世纪70年代《元史》点校伊始,国内尚未发现任何一部洪武全帙可用于参考,故采用百衲本做底本实属不得已情况下的变通之举,在当时版本条件下,算是最优选择。而经过近几年调查,版本条件已有很大改观。2007年,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修订,党宝海教授即着手系统调查国内公藏《元史》版本,最为重要的发现无疑是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NC/2700/3933.13)。与此同时,刘晓教授访学东瀛,携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馆藏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史-1-2-73)全部照片。以北大、京大两部洪武配南监本相配补,《元史》洪武刻本全貌几乎可以得到彻底复原,修订工作的版本基础自此获得根本性改观。因此,在《元史》修订于2020年重启后不久,经过修订小组会同中华书局商讨,决定放弃百衲本,而改用洪武本作为点校底本。

第二,史料不断涌现、整理,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资料,都有大量新成果得到披露。例如,《全元文》《全元诗》泽被既广,实际上还有进一步利用、充实的空间;《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料》《元代碑刻辑释》《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近年相继出版,以此为契机,相关石刻材料、纸背文书不断得到披露;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艺风堂、柳风堂旧拓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均极大拓展了元史文献的外延。此外,国家图书馆及天一阁博物院所藏《元史》修纂者徐尊生文集材料同样颇有价值。然而,对这些材料的利用还算不上充分,对其蕴含的价值应当深入挖掘。

第三,《元史》衍生、关联文献研究日渐深入。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围绕《圣武亲征录》《经世大典》《六条政类》《国朝文类》等,均有足以统摄全局的成果,值得研究《元史》者参考。幸运的是,文献研究凋敝的情况近年来有所转圜。一些学者通过离析史志目录,判定材料来源并还原形成经过,擘画出更为广

阔的研究面向,也为《元史》及其衍生文献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在本世纪中华书局重启二十四史修订的背景下,考订正史的专门研究也不断涌现。流风所及,“史源”研究的风头一时无二,文本学、书籍史厚积薄发,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给养。《元史》文献学研究沾溉于此,探讨单篇“史源”的专论不断涌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鹦鹉学舌掀起高调者有之,陷入机械化、庸俗化窠臼者亦有之,尤其需要警觉。

不断深化“实物第一原则”

在元史研究者当中,老一辈学人较少关注实物版本,这固然有物质条件不足的原因,但无须讳言,不少学者对版本研究依然抱持轻视态度,从而导致对《元史》最早洪武刻本,以及其他存世抄、刻本的调查先天不足。这背后的思想脉络隐然可见。清代学者洪亮吉曾论“藏书家有数等”,继述“考订”“校讎”“收藏”“赏鉴”“掠贩”之科第,从当前的视角看,实在浅薄不经。洪氏以“考订家”自矜,然而,究其平生为学为文,不乏虚悬鹄的之讥。实际上,文献版本家所为学,乃以“掠贩”“赏鉴”“收藏”为“校讎”“考订”之先导,这也就是实物第一原则。非“玩物丧志”、沉潜其中,不足以成就文献学。若以“考订”为第一要务,则容易蹈入虚空之论。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在其《宋版的形态特徵及其鉴别法》中明确指出,版本研究“宜步武书画鉴定,以直观为先,关照字体、墨色、纸质,先有第一印象,继而推理验证其正确与否。倘以推理为先,则会陷入合理化陷阱。臆鼎弥加精巧,益觉其伪迹合理,不免惑于其中,愈加难以自拔。因此,予一律凭直观感受,再推究考察其真伪”。此言得之。

实际上,“文献”本身包含文本内容与物质载体两个基本层次,“文献学”则是立足于文本及其载体的综合性学科。当下人文学科已不存在纯粹的“旧学”,较之百年以前,其精神内核和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分科但有版本、目录、校勘之学。然搜稽旧说,可见“文献”之名,却无“文献学”之称。所谓文献学,其精神实质更接近于西方“新书籍史”以及日本“书志学”“图书学”,产生至今也不过二百年左右。前者诞生于西方现代文学、古典学领域,侧重还原文本及其载体的“生命历程”。20世纪初传入日本之后与旧学合流,催生了“书志学”(又称“图书学”)这一崭新学科。如今所谓文献学规范除在精神实质上接续颇千里、段玉裁之外,也有无意间从这一舶来谱系中吸取养料。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元史》过程中,须关注诸传本的物质形态,注重文本内容与载体之间的相互贯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逐叶翻检、上穷碧落的笨功夫。在此基础上,尝试亲近文献产生、衍变的时空情境,在历史学思路下,努力开拓《元史》版本研究的新局面。当下及未来须把握这一原则,将史学研究的时空观与传统文献学结合起来,旧材料、老“议题”依然可以结出硕果。

发展实物版本学是《元史》文献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技术发展也为《元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助力。当前数字人文方兴未艾,AI技术如日方曦,电子资源的获取也愈发便利,这些都极大降低了“掠贩”“赏鉴”的门槛。学者获益于此,切实促进了传统文史研究更新迭代。如果没有各种技术的加持,以及各行业理想主义者的推动,古籍版本学大概还是豪门墙垣内秘不示人的玄学,是深宅锁院内自我标举的权柄。今天的文献学研究更加年轻而富有朝气,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就版本鉴别而言,傅增湘、王国维、张元济、顾廷龙、赵万里、黄永年、宿白等前辈已为我们树立了很高的标杆。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尾崎康、藤本幸夫等不仅在学术观点方面泽被此邦,其数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的研究态度更是为学者提供了参照。近年来,学者颇为注重提炼范式,不仅在具体学术实践层面,更在方法论层面不断深化“实物版本学”的内涵和外延,使其历久弥新,足以昭示未来。

系,推动大学生快速适应数智时代。

另一方面,更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手段,突破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一则传统心理危机监测存在形式单一、监测不连续等特点。而利用数智技术构建心理危机监测平台,能够以更加实时化、精确化、全覆盖、隐私化的模式监测和报告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实现干预准确及时。二则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援助手段大多通过个体咨询和团体辅导等形式,难以覆盖和适应所有个体。而利用数智技术,大学生可以定制个性化心理健康服务,更加高效满足情况不同的心理健康需求。三则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以线下课堂为主渠道,受众面小。而利用数智技术,开发“数智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能够惠及更多大学生,以缩小不同大学生群体间的“数字鸿沟”。

学术探讨

一种更具进取心的动物哲学

上海大学教授 刘小涛 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单亚峰

重新审视关于动物的讨论

对鸟兽虫鱼之属,哲学家向来不是特别措意。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哲人多“出于王官”,思虑的指向以“修齐治平”为要。动物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利用价值上,正如孟子所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因而,尽管古人对动物利用的知识积累颇丰,比如畜犬、养鹤、驯鹰、相马,不过,关于动物认知的研究以及相应的哲学讨论不太常见。著名的濠梁之辩是个例外,但这个故事是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怀疑论结论为人称道。在佛教、道教的诸多文献里,确乎有论及“有情众生”“众生平等”的内容,然而,这些讨论的动机往往不是为了理解动物和人类,这些思想资源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价值,需要仔细评估。

在常见的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里,动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严肃对待。人们通常不会把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算作他的哲学著作;笛卡尔断言动物没有语言和理性,在这两点上都有别于人类;莱布尼茨认为只有人类具有认识到“必然真理”的能力;在霍布斯的名著里,人类摆脱动物一般的“自然状态”是当务之急;休谟明智地指出“动物赋有思想和理性”,可惜这些判断被他论述因果关系的文字抢了风头,几乎未引人注意;达尔文虽然声称动物和人“只有程度差别,不是种类差别”,但在文化和道德的议题上,他也有些犹豫不决。

过去的几十年,情形发生了剧烈改变。随着生物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关于动物认知、动物行为、动物心灵、动物伦理的哲学文献正在迅速积累。经验观察和实验研究表明:老鼠、蝙蝠乐意帮助同类;鲸豚类可以进行远距离的沟通,它们的歌声还有文化特征;黑猩猩社群里有复杂的阴谋和联盟;大象等哺乳动物会表现出哀伤、暴怒等情感;乌鸦不但会制造小工具,还表现出未来规划、因果推理的能力。对于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究竟该如何诠释?这些研究可能依赖的哲学假设是不是合理?它们对于某些哲学议题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对待动物的伦理规范是不是需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激发了哲学家的激烈争辩。甚至,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一些经典哲学文本中关于动物的讨论。

哲学家关心动物的理由

哲学家关心动物的理由不一,较为显然的理由有以下几个。

首先,这些经验研究结果给既有的概念框架和传统观念造成了显然的冲击。根据传统的哲学观念,只有人类是理性动物,动物都是出于本能的欲望行事。然而,实验表明,新喀里多尼亚乌鸦可以用喙拉动物绳子取得短棍,再用短棍拨动来获得栅栏后的一根长棍,然后用长棍取到容器底部的肉。这些行为是不是表明乌鸦有思想,有某种形式的推理能力或者某

种形式的理性?不管答案最终会是怎样的,我们都不能固守既有的观念而无视这些新实验结果。

其次,这些问题往往并不能完全交由经验科学来回答,它们有哲学问题的典型特点。一只黑猩猩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鸟,一只大鼠按下杠杆放出陷身水牢的同类,虎鲸帮助鳍受伤的同伴捕鱼,它们的行为算不算理性行为?又算不算道德行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进行动物研究的科学家会希望哲学家能提供关于“什么是理性行为”“什么是道德行为”的建议,而不是相反。

最后,许多哲学家发现,一些陷入僵局的传统哲学问题有可能因为动物的经验研究获得新的洞见。一个例子是智能的本质(包括思想以及作为思想构件的概念)。当代认知科学研究表明,许多动物有不同于人类的表征世界的方式;换言之,它们有不同的“认知格式”(cognitive format)。有些研究声称,哪怕是蜜蜂,也能根据它们的认知格式拥有概念和体现组合性结构的思想。由于在生理-神经层面和人类比较接近,也许,对其他动物的认知了解越透彻,我们就会距离理解人类心灵、人类认知越近。

动物哲学:保守与进取

根据我们的观察,围绕动物行为、动物认知、动物意识、比较认知研究、动物伦理展开的哲学探究,已经慢慢汇聚成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动物哲学”是这个领域的恰当名称。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英语文献里,“动物哲学”的表达不太常见,相关研究分别聚集在 philosophy of animal minds、philosophy of animal cognition、animal ethics、human-animal studies 等标签之下。

就汉语来说,“动物哲学”措辞简洁优雅,传达的信息也清晰明了。作为一个概括性的语词,它可以足够好地囊括与动物相关的各种哲学讨论。更具体地说,我们心目中的动物哲学有两种稍有区别的含义:一种较保守的涵义和一种更进取的涵义。

较保守的动物哲学是指关于动物的哲学研究,它可以参照科学哲学或人工智能哲学来理解。根据一种获得科学哲学家青睐的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研究那些科学不能回答,以及为什么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形而上学问题、认识论问题 and 价值论问题。正如科学中产生的形而上学问题、认识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构成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人工智能产生的形而上学问题、认识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构成人工智能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动物研究的各个领域产生的类似问题也构成动物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虽然“关于动物的哲学研究”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域,但它的辩护负担相对小一些。因为确实有许多和动物相关的哲学问题,它们自有其吸引人的认知价值。而且,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观念来看,“科学的动物观念”无疑是“科学的世界观念”的一部分,后者正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曾想极力推进的哲学探究目标。

■ 见地

数智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助教 岳 磊

际连接,到用外卖、出行App满足生活需求,再到用文娱类App丰富课余时间,数智技术已如空气般融入大学生的日常。作为拥有先天“数字基因”的群体,大学生对于数智化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度无疑高于其他群体,数智化已经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特征。

数智时代给心理健康带来挑战

以 ChatGPT、DeepSeek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标志着社会已经从数字时代走向数智时代。这要求大学生除了主动拥抱数智技术以给生活、学习、娱乐等方面增色增彩外,还要面对数智时代给心理健康带来的挑战。从个人层面来讲,数智技术高速发展,与之相对,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慢

速转变,二者难以同步发展。学生在数智技术的连接和断连之间如何保持动态平衡,以获得较高水平的数字幸福感?如何在种类繁多、信息繁杂的数智技术中过滤低质量、无关的信息和技术,以减少认知资源损耗?如何更好地在数智世界中利用数智技术助力问题解决和自身成长?这些可能是个体每天都会面临的内心拷问。从群体层面来讲,数智技术的普及和使用可能会在无形间加大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学生如何轻松获取数智技术带来的个性化心理健康服务?数智素养欠缺的大学生如何科学高效利用数智技术?数智弱势群体如何避免被“心理健康状态标签化”?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